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DEVELOPMENT
&STRATEGY

段 鹏 著

政治传播
历史、发展与外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DEVELOPMENT
& STRATEGY

**政治传播
历史、发展与外延**

段 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段鹏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657-0371-3

I. ①政… II. ①段… III. ①政治传播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2758 号

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

作 者 段 鹏

责任编辑 黄松毅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mm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371-3/D·0371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早期的政治传播活动与政治传播学的诞生 / 1

- 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活动 / 1
- 二、西方早期政治传播活动 / 11
- 三、政治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 / 18
- 四、新媒体技术对政治传播学发展的影响 / 23
- 五、全球化对政治传播学发展的影响 / 26

1

第二章 政治传播的基本定义与框架结构 / 28

- 一、政治传播的定义 / 28
- 二、政治传播的特征 / 41
- 三、政治传播的重要性 / 48

第三章 政治传播学的发展与未来 / 53

- 一、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 53
- 二、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 / 56
- 三、政治民主化趋势与政治传播学 / 65

第四章 政治传播与大众传播 / 68

- 一、政治传播中的大众传播 / 68
- 二、大众传播中的政治内容 / 75
- 三、政治传播的行为主体与代理人 / 80
- 四、政治传播与大众传媒的互动 / 88

第五章 政治传播中的宣传与政治说服 / 92

- 一、政治新闻 / 94
- 二、政治宣传 / 98
- 三、政治广告 / 105
- 四、政治辩论 / 110
- 五、政治说服与技巧 / 114

第六章 政治传播的效果与测量 / 119

- 一、控制分析的角度考察 / 119
- 二、内容分析的角度考察 / 122
- 三、媒介分析的角度考察 / 125
- 四、受众分析的角度考察 / 133
- 五、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 / 138
- 六、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来考量政治传播效果 / 139

第七章 我国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 / 142

- 一、印刷媒介 / 144
- 二、国际广播 / 147
- 三、电视 / 150
- 四、通讯社 / 155
- 五、互联网络 / 157

第八章 我国政府改进对外传播现状的对策 / 163

- 一、宏观层面的对策 / 164
- 二、微观层面的对策 / 180

第一章 早期的政治传播活动与政治传播学的诞生

从广义上来讲,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传播活动。政治传播是传播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发展。有效的政治传播活动有利于国家的稳固和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人类传播活动的演进经历了符号和信号时代、说话和语言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① 政治传播活动作为传播活动的一种,大体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活动

政治传播活动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然而,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产生之前,即尧、舜、禹时期,在其部落生活中,就已经出现了政治传播活动的影子。《尚书》的篇目之一《尧典》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集体商定国事的情形。联盟议事会是原始民主制,他们的讨论及其结果的传达要通过“口传”实现。又如《皋陶谟》,其中的“谟”意为“谋”,记载舜、皋陶、禹三人商谈的会议记录,其中讨论了许多与国家治理有关的问题,由后人根据传闻追记,这恰恰说明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就较为注重体察民意。军事是政治

^①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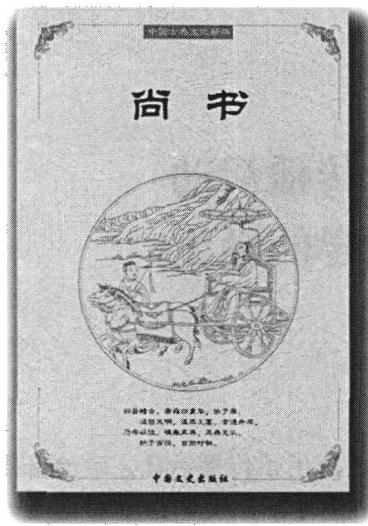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

2

令，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仍然主要依靠口头传达^①；国有大事，“王命众悉至于庭”，就是要“口头发布消息和命令”^②。

我国最早的口传政治记录是金文上的诰辞。这些诰辞专门记录周天子对臣下的训导，是周天子在使用语言这一文化力量进行政治管理的表现。^③

这一时期政治传播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普通民众也通过歌谣、谚语、隐语、笑话等形式表达他们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一些处在边缘的知识分子也利用这些民间话语方式试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统治者对民意也是十分关注。《国语·周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④诗、曲、书都是来自社会的信息，是天子听政、观民风的重要资料。《左传》引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军事号令也是政治传播活动的重要表现。虽然这时正式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但这一系列活动已经呈现出政治传播活动的早期雏形。

随着国家的建立，政治传播活动也更加频繁并不断深化，形式也逐渐多样起来。

(一) 上古时期

上古时期，传播工具非常匮乏，无论是传播知识，传达命

令，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仍然主要依靠口头传达^①；国有大事，“王命众悉至于庭”，就是要“口头发布消息和命令”^②。

我国最早的口传政治记录是金文上的诰辞。这些诰辞专门记录周天子对臣下的训导，是周天子在使用语言这一文化力量进行政治管理的表现。^③

这一时期政治传播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普通民众也通过歌谣、谚语、隐语、笑话等形式表达他们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一些处在边缘的知识分子也利用这些民间话语方式试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统治者对民意也是十分关注。《国语·周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④诗、曲、书都是来自社会的信息，是天子听政、观民风的重要资料。《左传》引

① 参见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 页。

② 转引自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③ 参见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7 页。

④ 转引自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3 页。

《夏书》：“道人以木铎徇于道路。”^①道人是政府官员，肩负着上传下达的任务，既向百姓传达君王的旨意，又向君王反映民意。

由此可见，尽管上古时期的传播工具并不丰富，但政治传播活动的内容却是：既有君王命令的下达，也有民意的上呈，并且有专门从事上传下达的官员。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网络虽然并不庞大也并非重要，但却是已经存在的了。

（二）先秦时期

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先秦时期产生了奴隶制游说舆论。这种舆论充满了鲜明的阶级功利色彩，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统治阶级为了蒙蔽和麻醉人民，往往选择知识分子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制造出各种舆论，并说服广大民众接受。游说之士大多四处奔波，周游列国。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一国养士的数目，游说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奴隶主制造舆论效果的好坏，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国的影响力。

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说服理论逐渐发展起来。这里所说的说服理论与传播理论中的说服(Persuasion)理论从内涵上看是一致的，都是“由于接收别人的信息而产生的态度改变”。^②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充斥在社会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几派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了“君臣父子”的观点，孟子主张推行“王道”，施行“仁政”，这些都成为整个奴隶社会的统治思想，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维护统治；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无为而治”和顺其自然，这种思想教导百姓要安于现状，放弃反抗，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也是其维护统治的工具；以韩非子为代表

① 转引自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② 转引自〔美〕Werner J. Severin/James W. Tankard Jr.著，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2006年版。

的法家学派主张变礼治、德治为法治，所谓“法”即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所颁布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政策法令^①，这些法令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因此，法家的思想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兼爱”即博爱，“非攻”即反对战争。墨家学派反对儒家学派的一些观点，认为当时社会百姓的苦难源自统治阶级的剥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平等互利的社会，这种观点虽有反对当权者的意味，但并不支持人民起来反抗，而是以“非攻”的思想教导人们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一时期，除了游说舆论、说服理论得到发展之外，传播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教育作为一种观念行为、文化行为而被提出，^②特别是诸子百家的教育活动于战国时期达到了兴盛。由于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旧的统治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新兴阶级的需要，各国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纷纷开始招纳贤士。因此，各家为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不仅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也帮助了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

通过对这一时期政治传播现象的总结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政治传播活动的形式已经开始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趋势，也发展到了更深的层次，传播活动的目的性更强，作用也更加明显。

（三）秦汉时期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割据战乱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此，中国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传播活动也是同样。统一的国家意味着国家机构体系更加完善，信息传递

^① 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著：《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7 页。

^② 同上，第 71 页。

渠道更加顺畅,信息的收集和反馈更加有效,信息的监控和政治传播调节力度加强,政治传播系统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有利于政治传播活动的进行。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传播工具较之前一时期更为丰富,政治传播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为了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发展,秦始皇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修筑道路、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推行郡县制、制定秦律、兴邮驿以更快地传播政令等。这些政策都促进了政治传播活动的进行,其中最重要的即是统一文字。

先秦时期,没有统一的文字形式,“田畴异轨,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要求全国统一使用小篆,废除了异形字,并编写了全国统一的认字课本,这一做法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其最终目的仍然在于维护自身统治。

为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秦始皇也实行了一系列残暴的政策,以焚书坑儒最为著名。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主张“不师今而学古,以吏为师”,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出现了“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②的局面,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办私学。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启了中国长达 2000 年文字狱的历史,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残暴的迫害,但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统治的目的。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呈现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延续性,以致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这种结果与当时的政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

^① 转引自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著《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 页。

^② 同上,第 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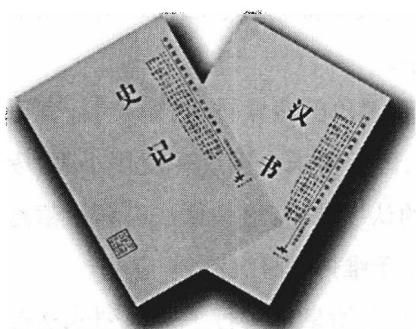


图 1-2 《史记》、《汉书》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大力传播，有效地巩固了当时的统治，也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政治传播活动主要是游说，那么这一时期的传播就主要通过书刊进行。《史记》、《汉书》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著作，其中不乏歌功颂德的篇章，《史记·峄山刻石》

记载：“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召，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

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①”这段文字主要歌颂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然而，在西汉时期，汉赋和乐府逐渐成为表达民意的一种途径，表达了下层人民的呼声。西汉时期的政论文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体，这种文体用于表达文人对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最为著名的政论文家是贾谊和晁错。贾谊的名篇《过秦论》，通过秦统一天下和轻易的亡秦，引出秦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对后来统治者起到借鉴作用^②。

^① 转引自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著《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 页。

^②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编：《文史要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

东汉时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解放奴隶、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这些诏令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维护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东汉末年,王朝已经腐化堕落,国内阶级矛盾相当尖锐,传播宗教迷信成了东汉王朝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佛教主张人的肉体死亡,灵魂永存,可以转生来世。教导人民忍受苦难,广施善行的思想正符合了统治阶级的意愿。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可。在统治者的有意宣传下,佛教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维护统治的一大工具。

这一时期,国家也开始了对外交往活动。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本意是要与大月氏结成同盟,共同抵抗胡人的进攻,虽然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却开通了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的要道。

(四) 唐宋时期

公元 581 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的战乱局面,建立隋朝。为巩固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官制,建立科举,选贤任能,修订法律等。这些措施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新生政权得到了巩固。

隋朝虽然没有达到唐朝那样辉煌的成就,统治时间也很短暂,但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这一举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传播活动。大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维系中国南北两方的统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偏弱的问题,也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官方发布新闻在唐朝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传播渠道。官方的传播系统大致包括:露布、条报、进奏院状报和榜示等^①。

露布是军事捷报的别称,重在报道战争,其影响力很大,能迅

^① 参见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著《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7 页。

速在人群中形成舆论影响，起到鼓舞士气、瓦解敌军意志的作用。其报道翔实，后被规范化、礼仪化、精致化，并成为官方新闻传播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条报是中央政府发布宫廷新闻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皇帝行踪、官吏的任免和朝廷的一些动态。

唐朝的官方传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进奏院。据一些学者考证，中国最早的报纸出自归义军进奏院。进奏院的职能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考察，大致是向朝廷呈报相关事件并向地方传递朝廷信息。简单说来就是承担上传下达的任务，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于政治命令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进奏院状报就是“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和地方诸道，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报告”^①，其主要读者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百姓无法阅读，因此覆盖的信息范围较为狭窄，主要是官员所关心的朝廷相关信息。虽然对进奏院状报是否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报纸，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我国较早用于官方发布消息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

邸报，是唐朝时期发展出的另一个重要政治传播工具。邸报虽产生于唐代，但是直到宋代才有了统一的发行机构，并且由于雕版印刷术产生，促进了报纸的大量发行，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由手抄时代进入了印刷时代。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官员的任免，这是官吏了解政治形势的重要途径。邸报的出版周期根据政事的更新而定。宋代官报除了仍有“进奏院状报”外，还有主要用来报道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和一些敌军的活动情况的官方报纸——“边报”。另外，这一时期，条报也不只在都城的各级官吏之间传播，而开始经由各地方进奏院抄送后，流传到外地。

除各种官报之外，宋代还有一种用于传达政府命令和百姓知晓政事的“榜”，“榜”分为两类，即“朝榜”和“民榜”，前者的主要受众是官吏，而后者的受众是普通百姓。“榜”的内容主要包括官员

^① 参见郝朴宁、陈路、李丽芳、罗文著《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罢免、法令信息、战争讯息、大臣奏章等。发榜大多在人群密集的地区,榜文在传达政治信息的同时具有强制力,发榜之日有效,收榜之日失效。

宋代已经初具新闻控制的概念,在初期主要由进奏院负责控制、管理国家的新闻事业,包括对新闻进行事前检查,并制定一些规定,颁布法令,规范新闻行为。除此之外,进奏院还要承担传统的传递信息职能,包括向地方传达朝廷政令的任务,以及接受来自地方的信息向朝廷汇报,这些信息既包括军事信息也包括地方灾情,由于惧怕负面信息会招致灾难,统治者禁止传报灾情和战败信息。对信息传递的严格控制使得社会上流通的信息匮乏,于是秘密传报行为开始出现。为防止秘密传报,朝廷对接触机密的官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并对泄密者处以重刑。然而,限制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信息传递,宋朝逐渐建立起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朝廷规定了阁门抄报状的频率,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分工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严格执行。宋代还对出版业加强了控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了在内容出版之前要经过审阅,明确了禁止传播的内容和违反者应受到的处罚。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规范政治传播活动,维护统治。

唐宋时期的对外交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较为鼎盛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航海造船技术非常先进,波斯、朝鲜、日本等国纷纷派使节前来中国学习,在频繁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也将自己先进的政治经济理念传播到国外。

唐宋时期在传播技术、传播内容、传播制度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活动已经具有系统性,也比较完善了。

(五)元明清时期

与前朝相比,元明清时期对新闻传播的管制更加严格,传播体系也更加严密。

元明清时期已经是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在这一时期都暴露得愈发明显，为维护统治，统治阶级加强了对新闻传播的控制和管理，但政治传播活动在这一时期却更趋活跃。

元代没有官方报纸，但政治传播活动仍在继续。元代官方的政治传播活动主要在中书省，统治者的命令、旨意等都要通过中书省下达到地方，地方也要通过中书省汇报政事。

明代承担着传达官方信息的部门是通政司，民众如有大事要事汇报，都要呈送到通政司，统治者通过它了解民间舆论动态，监督官员的行为，以维护统治，同时督促官员将民情上报。明代统治者很重视通政司的工作，将其视为了解民情的重要途径。

明代的工、刑、礼、户、吏、兵六部要将经皇帝批过的奏章抄送出来，交给相关部门，那些可以公开抄送的内容经过整理就是朝报，发行到京城之外的，则被称为邸报。这些邸报用来报道朝廷的事务，官员通过邸报了解统治者的看法和各项事务进展的情况，明朝的邸报还会报道一些外交往来、社会新闻和评论等，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较高的政治透明度，并有专门负责传递邸报和文书的官员。除邸报外，明代还有专门发布军事和外交消息的塘报，塘报一般不对外发行，到明末时期管制有所放松。

明朝末年，社会上出现了“牌报”、“旗报”等民间报纸，明末的农民起义军为宣传其政治主张而发行的牌报和旗报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味，起到了宣传起义军政治主张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清代官报仍沿用手抄形式，发行量小。这一时期对言论的管制非常严格，特务统治盛行，消息被严格封锁，接触新闻发行的官员也受到管制。自秦始皇时期开始的文字狱也在清朝发展到顶峰，比如发生于康熙时期的“明史案”株连大约七百多人。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政府均尽力调动封建政治制度的组织力量来消灭民间报纸，并由政府向他们提供信息，最终使民间报纸成为统治阶级发表言论的工具。这些活动都为维护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西方早期政治传播活动

西方各国早期的政治传播活动虽然都呈现出本国的特色，但其主要目的均不外乎传递官方信息。据文献记载，西方最早的政治社会化开始于奴隶社会，而政治传播正是政治社会化在传播方面的表现，是统治阶级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的培养维护统治人才的活动。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其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文化氛围闻名于世，它们几乎是西方一切著名思想和文化的源头，政治传播活动也不例外。

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斯巴达国对教育和公民的私生活已经开始实行严格的控制，其教育制度提倡公民成为可以为国家献身的军人，并逐渐将军人应具有的团结、服从、尚武、吃苦、禁欲、牺牲等精神贯彻到公民的现实生活中去。

古希腊和古罗马在立国之初就很重视对公民的教育，重视纪律。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现象研究的学者就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其名著《理想国》中指出：“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公正和美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为所欲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因此他认为，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达到理想的统治境界，就要依靠哲学王^①。哲学王充分利用说服手段，向着正确的方向重新塑造人性，净化人的心灵，以达到和谐统治的目的。他主张国家必须牢牢地掌握各种教育手段，制定更严格的教学计划。

公元前59年，恺撒当选罗马执政官，下令每日公布元老院和

^① 柏拉图将人分为三个等级。从原则上讲，第一、二等级都是统治阶级，但真正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仅仅是第一等级中的一个人。在他看来，人类天生不平等，注定只能由最少数具有智慧和知识的人统治最多数人，就是“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柏拉图指出，哲学王是除上帝以外的“更善的模范”，国家和个人只有经过哲学王的治理才能达到至善。

会议记录,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每日纪闻》,它是最早的公告式的官方报纸,其内容多为政府要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各国的政治传播活动均逐渐活跃起来,以下我们将介绍主要西方国家早期的政治传播活动。

(一) 英国

英国是现今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也是早期政治传播活动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早在13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手抄新闻,后来又发展为新闻诗和新闻信,然而这些报道形式在时效性和传播面上存在某些局限,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它们逐渐被印刷新闻书所取代。

虽然英国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非常活跃,但仍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封建社会时期,英国的报业一度受到政府的限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1528年颁布一系列命令,限制出版业的发展。1530年,特许希顿(Tomas Hitton)售卖神学家德尔(William Tyndale)翻译的《圣经》,标志着特许制的开始。1538年,皇家特许制度正式建立,规定所有出版物必须经过事先许可才能出版。1557年,玛丽女皇(Queen Mary)成立了皇家特许出版公司(Stationer Company),公司规定,在联合王国之内,除公司会员和女王特许者,其他印刷一律禁止。该公司不仅在管制诽谤、恶意言论攻击和异教言论方面非常有效,也取得了独占出版及管理非法出版的特权。1570年,皇家出版法庭设立,除审判民事、刑事案件外还涉及一些政治案件;1586年,“出版法庭命令”颁布,对英国出版业严格限制,违反者将受到程度不同的惩罚,在这种严格的管制下,虽然对巩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激起了民众的反抗。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对新闻业的管制相对放松,但这种放松又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于是,1643年,英国重新实行出版特许制,除国会有权管理出版外,还设立出版检查委员会和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同时进行管理。这一时期,政权变动频繁,政治传播活动